

历史档案、内部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资料。

四、回望集体化：山西乡村社会变迁

1、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考。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一种核心的问题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

2、中心相关研究，综合运用官方文件、公告与农村基层文书、账册，既考虑到了政治史发展的宏观脉络，又充分关注微观的乡村场景，以村庄、公社、县域或独立的河流和水利体系为研究单位，涉及到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妇女解放、医疗卫生、日常生活等方面。

第二部评论

内山雅生（东洋文库·宇都宫大学）、祁建民（长崎县立大学）

第二分组会的主题是民众、集体和国家，主要讨论民众与国家的问题。刚才两位老师分别讲述了民间书信和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整理情况，特别提到了其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下大力量收集民间资料，还进行相关田野调查，对于书信作者或产生资料的村落进行实地调查，与文字资料相印证，这些都是从国家和政府的档案文献中很少能看到和了解到的，所以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和精彩。地方和民间文献与国家行政当局的档案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值得重视。特别是在以民间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史研究中，解读这些文献时应与已经被卷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民间以及政治问题保持有一定距离。

我们认为对于民间或地方文献，在使用这些文献时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从这些民间和地方文献中如何理解个人、局部与国家 and 整体的相互关系问题，避免研究的“碎片化”。要将个人与社会，村落与国家联系起来考虑。并且要由此发现以往研究的不足。这方面，日本学界利用村落文献，已经有很好的研究。

日本的近世史研究中有被称作“地方文书”的文献。主要是对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封建体制时期形成的有关农村旧文书的总称。比如神奈川县，1868年时有945个町村，有关旧文书截至到1972年共存有25万件。东京大学牧原成征老师在《近世的土地制度与在地社会》一书中利用近江地区文书，对于一个叫东野的“小领主”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土地账簿的分析，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就土地问题，特别是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时代土地所有情况的变化进行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从明治到昭和时期的农村社会文献也极其重要。比如曾任金泽大学教授的林宥一老师，充分使用长野县五加村的史料，深入探讨了昭和恐慌时期的租佃争议情况，从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农民运动的社会历史构造。通过他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近代日本一个地方行政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在近代是如何变化的，又是如何陷入危机而再加重建的。他的研究论文收录在大石嘉一郎、西田美昭主编的《近代日本的行政村》一书中。五加村史料不仅是描述日本农村社会末端的基础史料，同时还是解决理论性问题的实证性资料。山西大学的农村基层档案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农村的“地方文书”，由此可以从村落角度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

其次就是民间和地方文献的可信度问题，由于这些文献产生于非官方或上级国家机构，文献的内容虽然生动具体并且十分丰富，但是也有随意性和不规范的问题，不能由于是来自于民间或地方，就认为这些文献就完全真实可靠，应加以甄别和分析。

比如民间书信，本来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信息和情感交流，具有隐私性。但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时期，公民个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一些特定人群的通信权利则受到限制，这样，他们在书写信件时就有可能考虑到这封信可能会被别人看到，因而不敢把真实的想法全写出来。中国1954年宪法第90条规定了“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但是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只规定了通信自由，而没有提到通信秘密受保护的问题。通信自由只是说通信不受干扰，让你写信，与通信秘密受保护的内涵不同。在1982年宪法第40条中才规定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后来的刑法第252条才规定了“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

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才真正将保护通信秘密列入法律保护范围。在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一些特定公民，比如四类分子、右派、专政对象以及一些被怀疑的人，其通信权利是受到限制的。他们的信件并不是由公安局等国家正式授权机关实行开拆的，而是由农村大队干部、工厂领导以及治保人员随意开拆、检查的。

特别是 1954 年的胡风事件之后，人们在写信时还要担心自己的书信会不会被收信者公开或上交。1954 年 5 月胡风在呈送中央的《关于舒芜》的材料中不当提级和摘引舒芜给他的私人书信。而 1955 年 5 月，舒芜应《人民日报》约稿，撰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中也大量引用胡风的书信，后来将这些私人书信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形成了所谓《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加以公布，首开了公开和利用个人书信进行政治斗争的恶例。从此，许多知识分子之间在书写私人信件时都时刻担心自己的信会不会被公开或上交，因而可能不敢写真话。其实，在中国早在 1930 年代，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就未经对方同意而引用对方信件。这种做法，在中国一时是并不为奇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观念淡薄。

在地方村落文献中，比如有人看到四清工作队的会议记录。工作队主要研究讨论他们上报的文件如何要按照上级的精神写出来，能得到上级的认可和通过，而不是按照村里的实际情况上报，这样写出的工作报告，虽然产生在基层，但是，其内容并不是农村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是按照上级的意思来写。所以其可靠性就有问题。村落资料中还有很多农民写的申请书、检讨书和决心书一类的，是农民写的，但很多是套用报纸文件的说法，比如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对此农民真正了解多少也要考虑。这种文件数量很大，但是内容基本雷同，大多抄自报刊文件。

最后，使用个人和地方文献也要注意个人隐私的问题，这涉及到学术伦理问题。农村文献中许多检讨书、揭发信中涉及个人的婚姻、男女关系和个人品质问题。这些人或他们的后代还活着，有的还生活在村里，引用和公开这些资料时就应特别注意。

第三部〈从档案资料考察“中国”的内与外〉

深化「胡適研究」的新工具——「胡適檔案檢索系統」與「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簡介

潘光哲（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在廿世紀的華人歷史舞台上，胡適始終占據樞紐的位置，沒有人能忽略他的存在。胡適信守堅持的理念，胡適努力以赴的事業，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啟發意義，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當然需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努力。然而，胡適獨特的生命旅程與思想世界，錯綜複雜，盡量避免將複雜的歷史圖像「簡單化」、「標籤化」的危險，我們對胡適的生命道路及其思想遺產的認識，方始更形精緻。不過，比較完整與便於利用的《胡適全集》，至今猶未問世；胡適與友朋之往來書信與其藏書的整理，也仍是未竟之業。因此，只有廣輯博收和胡適相關的材料，才是深化「胡適研究」的正嚮要道。

位於台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以下簡稱胡適紀念館），初建於 1962 年，迭經興革，向來就是海內外紀念與研究胡適的最重要殿堂；推動「胡適研究」，更是不遺餘力。

胡適紀念館以館藏胡適晚年時期（主要是 1949 年以後）的原始檔案資料為基礎，借助現代科技之助力，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合作，將分散於兩岸的胡適檔案與胡適藏書，完成合璧與

